

敦煌藏汉灸法图成书环境及年代探讨*

汤志刚, 蒲宁, 杨继若, 白晶梅, 卢荣, 王天生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 探讨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灸经图》为核心, 结合《藏医图文》等文献, 论证《灸经图》成书年代早于《黄帝内经》。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保存的五万余件文献中, 医药学文献百余种, 其中《灸经图》与《藏医图文》是现存最早的藏汉灸法图谱。

[关键词] 敦煌; 藏汉灸法图; 成书环境; 年代考证

[中图分类号] R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600(2025)06-0034-06

On the Environment and Age of Dunhuang Zang-Han Moxibustion Illustration

TANG Zhigang, PU Ning, YANG Jiruo, BAI Jingmei, LU Rong, WANG Tiansheng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Lanzhou City, Lanzhou 730050, China

Abstract *Jiuqing Tu* Moxibustion illustration unearthed from Dunhuang cave for preserving Buddhist sutra is chosen as the core, combined with the literature such as *the graphics and textures of Xizang Medicine*, it is proved that the age of *Jiuqing Tu* is earlier than that of *Huangdi Neijing (Huangdi's Canon of Medicine)*. Among around 50,000 pieces of literature stored in the caves of the Mogao Grottoes in Dunhuang, there were around 100 pieces of literature on medicine, *Jiuqing Tu*, and *the graphics and textures of Xizang Medicine* are the earliest ones of Zang-Han moxibustion.

Keywords *Dunhuang; Zang-Han moxibustion illustration; the environment of composition; chronological evidence*

莫高窟始建于前秦时期, 后经 10 个朝代, 1400 多年的发展, 给后人留下了一座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人类文明的曙光”的世界文化宝库, 其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1900 年, 敦煌发现石室藏经, 藏经洞内藏有从五世纪初到十一世纪初手写本文献及各种文物五万余件。据统计, 留在中国的仅为 15 000 件, 约有 35 000 件流失海外。所藏经卷中有医药学文献百十种, 被称为敦煌卷子医书, 与针灸有关的约有二十个卷号。

《灸经图》^[1]是敦煌医书针灸卷子其中之一, 现存于英国大英博物馆, 斯坦因将其列为罕见汉文书, 并把《灸经图》分成两段编号: Stein Rols No. 6168 与 Stein Rols No. 6262。考此两卷推知, 原书为一部绘有人体穴位的灸疗图谱, 图文多有缺损, 其中有 5 图基本完整, 尚能辨认者共计 18 图。同出于藏经洞的《藏医穴位图》(P. T. 1058) 与《藏医针灸方》(PT. 1044、PT. 127) 现收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内, 是已知年代最早的藏医灸疗法写卷绘本实物之一, 以上简称《藏医图文》^[2], 该文献早于《月王药诊》和《四部医典》(八世纪中

叶)。藏汉《灸经图》因与长沙马王堆帛书、《黄帝内经》等医籍有许多相异之处而备受瞩目。尽管原图残缺不全, 又缺乏明显确凿的成书年代证据, 但它遗留下来的图文痕迹就是确定其历史隧道的坐标。两者究竟在历史长河中产生在何种地域环境, 何时何代? 现探讨如下。

1 人杰地灵孕育出藏汉《灸经图》

甘肃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天水大地湾文化见证了 8000 年中华民族文明史, 也是人文始祖“伏羲”“女娲”“黄帝”的诞生和创世之地。敦煌莫高窟与天水麦积山石窟均始建于前秦, 同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敦煌现存的 500 余个洞窟中, 少数民族开掘的洞窟约占洞窟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藏经洞发现的 50 000 多卷古代文献中, 除汉文外, 尚有吐蕃文写卷 5000 件左右, 另有突厥文、龟兹文、粟特文等 17 种中外文字文献。中国传统医药学体系在形成过程中并不是封闭的, 一方面注重吸收外来医药文化, 另一方面也把中国的医药文化传播于其他国家和民族, 建立了互相依存的密切关系, 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

2 九宫八卦布穴源于天水卦台山^[2] 影响藏汉文化

5000年前,伏羲氏在天水卦台山仰观天文,俯视地理,创立易经八卦。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易经已成为中华民族智慧的源头,几千年来被推崇为“群经之首。”伏羲后被道教尊为天皇之神,它不但对中原影响重大,因地缘关系,易经对藏文化的影响也很明显。“苯教”是藏族原始文化的总称,其与黄帝(约公元前2000多年前)处于同期或近期年代。作为中国历史文化渊源的河图洛书,两者核心为“十”字图,与苯教“卍”型符号含义相同,中心一点为太极,衍生四面八方,包含了宇宙万物变化规律和吉祥信息。苯教认为其圣地地形为八瓣莲花状,上边穹罩着带有八个轮柄的轮形天空;九层“卍”型的山俯临着称为欧摩隆仁的大地。藏密斯巴霍中央的九宫表示时间轮回,外一圈以八卦表示宇宙空间,外二圈以十二生肖图表示生命轮回,正上方绘有文殊、菩萨、金刚手三圣像。斯巴霍被视为降魔伏妖、驱邪除恶的吉祥神物,成为藏区各教派的标志旗,其也是易经、苯教、印密天人合一思想融会贯通的产物。传统的针灸配穴组方一般遵循前后、左右、上下、表里、远近、循经、本经、异经、对症、子午流注等原则,而《灸经图》按照九宫八卦顺应程序布阵组穴,并按照天、地、人三才布穴。《灸经图》以任脉为主在人体前面布穴,九宫八卦图如车轮,关元如车轴毂,是周围八宫的统摄指导核心,位居中央之宫;其他发际、玉茎头、左右手髓孔、脚五舟、踝痺经中封如车辋围在关元四周八方;以督脉为主在人体后面布穴,从卦象上看四天庭属离火,双肾俞、三里、绝骨三阴叠加为地属坤土,脊中位居中央与大椎共同沟通离坤,六十四卦中上离下坤属晋卦,象征红日普照大地,万物繁荣昌盛;以上下天庭、大椎、脊中四单穴为四阳,左右天庭、双肾俞、三里、绝骨为四阴,以四阴四阳在人体后面布穴,见图1—2。以阴阳平衡为其恒久不变之理论基础,两图在头前头后都以离阳之火布穴,在下体以坎坤水土布穴,完全符合人与自然的变化和平衡规律。四天庭是八卦在人体最重要的组穴,四天庭布穴以天门为太极,上下左右布穴和以关元为核心的四周八方布穴均与“十”图相一致,其是针灸史上对于保健灸的首次记载,以使人体达到刚柔相摩、阴阳相济的和谐健康状态。成书于公元前15世纪左右的古印度《妙文集》在论述人体脉管系统时指出,24条脉管从脐发源而结成广布的网状。藏密认为人体生命的脉有左、中、右三条主脉,上达头脑眉间及两鼻孔,下达脐下四指处会合,又与4轮脉在此形

成脉节而辐射出5个组脉,如车轮,大脉分小脉,广布全身;以上观点与《灸经图》用易经八卦布穴三者殊途同归。说明不论是宗教文化还是医学,汉、藏、印在远古就留下了融会贯通的烙印。在这种多元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灸经图》,最早传承易经思想,并受藏、印文化影响,源远流长,这个流派存世的最早时间早于《黄帝内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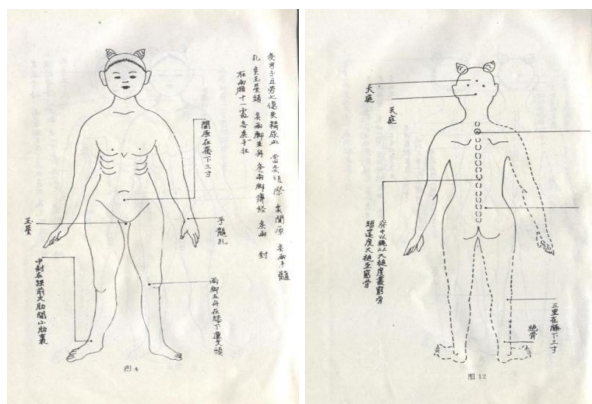


图1 临摹图4

图2 临摹图12

3 脏腑腧穴取2.3寸^[3]源于《藏医图文》

从考古发现的资料可知,早在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藏族先民就已经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劳动、生息和繁衍,由于特殊的高寒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这里成为灸疗主要发祥地之一。公元前637年,与释迦牟尼同期的藏族苯教辛饶米吾时期火灸疗法已相当发达,又兼取博收汉医等国内外医学的实践经验,成为独具风格的理论体系。P. T. 1044的特点之一即为取背部第一侧线穴位时,均取距正中线旁开1.3寸。且文末标有“从印度国王家乡得一疗方为”之语,并提到大食(伊朗)、突厥等地名,因此文中称“以上诫治文书连王库中也没有,是集一切疗法之大成加以吸收了象雄深奥的疗法写成。”道教也有“丹田位于脐后1.3寸处,上丹田位于天目穴后1.3寸处”的说法。由日本丹波康赖所著成书于984年的《医心方》记载唐代以往诸家杂说取背膈法多有不同,有1.3、2.3、3.3寸等末尾带3的取穴方法,这是与传统针灸1.5寸和3.0寸截然不同的取穴方法。传统针灸以拇指除外合并的四手指为其同身3寸取背膈外线,一半距离取背膈内线;其一,1.5寸和3.0寸两条循行线的中间线为2.25寸,与2.3寸尚缺0.05寸,如果按惯例用四舍五入原则正好是取椎节两边相去2.3寸,这也是2.3寸取穴方法解释之一;其二,2.3、3.3寸等取穴方法源自《藏医图文》的1.3寸。宗教文化在医学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藏经》涉及医学内容有400

余部,涉及医学名词术语的词条有4600余条。道教医学始于秦汉,形成于魏晋,内容丰富,是我国医学的瑰宝,其崇尚内修外养,提倡辨证治病、整体治疗。以道家思想为哲学的观念影响着中医学发展。PT. 127记有灸次,为5、7、9、11、17、19次单数不等。东晋葛洪(约公元283—363年)的《肘后备急方》只言施灸部位,多不言穴位名称,灸法灸壮体现道家风格,以1、3、5、7或17、27、37壮施灸。佛教有三宝、三密、三身、三界、三部、三藏、三学、三业、三昧、三智、三脉等;道教亦有三生、三清、三官、三元、三教、三圣、三生万物等;佛、道朝拜要磕三个头、烧香要上三炷香等崇尚三的风尚,都将3视为吉祥定律之数。针灸史上背部腧穴、灸次均为单数,是《藏医图文》与道教医学独具的特征。因为单数为阳,七为阳之初生的少阳,取穴灸法在于补阳助阳之故。背部腧穴取1.3寸首见于《藏医图文》,由此也可以认为1.3寸最早出于《藏医图文》,而《灸经图》2.3寸是借鉴了《藏医图文》1.3寸发展而成。藏经洞同时出土的《藏医图文》《灸经图》与长沙马王堆《足臂十一脉灸经》都是存世最早,只灸无针的灸法专著。藏汉灸图均在人形图内点记穴位,图旁引线标记穴名和部位;《藏医图文》与《足臂十一脉灸经》对穴位虽然有一定认识,但只标记施灸穴点而无穴名,以体表标志为主,如髌白之凹处、置于小腿肚处、足拇趾与第二趾之间、从足尖起向上量四指处。《灸经图》有“肩井肩隅在肩上宛宛中”,这与《藏医图文》的“肩膀上部之凹窝中”类似,其他如足太阳在踝外后一寸,宛宛中与踝骨后之凹处;髓孔在足外踝上三寸,踝骨凸起处向上量至四指处;两脚五舟在膝下廉文头与膝盖关节处;两足心与足之……(中心);令人垂两手中指头股上(传统风市穴)与躯体伸直,两手伸至大腿(外侧),其中指所触及之处;从大椎至十三椎节、在第三椎、在十九椎与第三椎节的下部关节、第十一(椎节)、第二十一节等穴位。《灸经图》虽然也以人体部位、自然标志取穴较多,但已有了较多穴名,《藏医图文》的成书年代在学术界有多种说法,认为其抄写于8~10世纪,但其成书年代应该早于《足臂十一脉灸经》和《灸经图》。

4 中外脉道学说的渊源与传承

脉络中外脉道普识延续相传古埃及、希腊、印度,玛雅与中医、藏医学渊源甚早,在经脉一类的联系通道、刺络放血法,认为人体上存在若干具有特殊意义的“点”的叙述都有许多共性之处。藏医的“三因”“七基”学说与古希腊医学的“三种活力”“七种基本要素”观点一致。成书于公元前17世

纪左右的古埃及纸草文医学,其中认为心脏是人体的中心及灵魂的居所,26条脉管主要由心脏发出,内连脏腑,外连五官全身。《黄帝内经》提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心主身之血脉”。两者认识非常相似,甚至“脉”的发音也一致。从时间上分析存在最早的埃及纸草文医学→古印度《妙文集》→《藏医图文》→《足臂十一脉灸经》→《灸经图》→《黄帝内经》的传承路线。《藏医图文》中已有心脉、肝脉、肺脉、肾脉、三焦脉、眼脉的提法,但无具体脏腑经脉循行,仅为施灸部位。在绵阳市双包山汉墓中出土了一木质人形,有手与足的三阳脉及手三阴脉与督脉,共十脉,此模型较北宋针灸铜人早1000余年,也是有脉无穴。《足臂十一脉灸经》有了初期的十一条经脉,如足太阳脉“钜阳脉(脉):潼(踵)外踝委中,出中,上穿(臀),出猷(厌)中,夹(挟)脊,出于项,□头角,下颜,夹(挟)(髑), (系)目内廉”。足太阳脉在人体有脉的起点、终点及具体循行部位,两侧的走行呈现为单线路,各有一条。虽然《灸经图》有穴无脉,但膀胱经腰背腧穴均在2.3寸直线上;在项后两厢宛宛中有风府穴(其部位应是天柱穴);在风府穴旁两指凹陷处有风池穴(其部位应是玉枕穴);在前额有曲眉穴,两眉间,眉毛头是(攒竹穴);在下肢有足太阳穴,在踝外后宛宛中是(昆仑穴),有足小指头穴(至阴穴);一条单线路走行,有准确尺寸及穴位标记的足太阳脉。与《黄帝内经》相比,《灸经图》中足太阳经脉、穴位、穴名显得简单。从《藏医图文》仅有脏腑经脉名称→双包山木质人形十脉→马王堆《足臂十一脉灸经》足太阳有脉无穴和单线路走行→传承发展到《灸经图》足太阳简单的有穴有脉和单线路走行→《黄帝内经》完整的十二条周而复始的循环经脉系统、穴位、足太阳经脉双线路走行,《足臂十一脉灸经》一源二岐,《灸经图》成为古代膀胱经单线路走行流派的最早代表,而《黄帝内经》成为古代膀胱经双线路走行流派的最早代表。关于“脉”的认识,中外风格类似,眼脉的出现非常独特,在古代还有如肩脉、齿脉的提法,不难看出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和不同点,反映了它们之间渊源关系和各自不同历史阶段的风貌,三者相比,《藏医图文》更显示出古朴、原始、久远的特色。2500年前,针灸经络的发展初期诸子蜂争、百家争鸣,形成足太阳膀胱经的循行分为单线路循行与双线路循行两大派别。长沙马王堆《足臂十一脉灸经》从《足臂十一脉灸经》不确切的部位到《灸经图》较确切的穴位前进了一步。这种差异使我们看到了古代早期针灸经脉腧穴产生、发展、

过渡、演变、更替的历史痕迹。

考究其成书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墓葬年代为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普遍认为这些脉书为秦代(公元前221—207年)所抄录;其著作年代更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即公元前6世纪前后,因此可以说《灸经图》这个流派存世的最早时间应该在《足臂十一脉灸经》之后,早于《黄帝内经》。

5 史上最早藏汉裸体灸穴图一脉相承

《藏医穴位图》与《灸经图》都是中国现存针灸文献中最早且唯一的裸体针灸图谱。《藏医穴位图》为两幅线描直立裸体的侧位人体图,图上标有19个穴位,另有31个穴位说明,但缺正面和背面图。刘英华根据原图的残存文字,还原出一幅缺失的背部穴位图,见图3。各图都有从头顶束发左右分开的两个发髻,肋骨标示分明。图4形体面形小巧清秀,胸部两乳丰满,拟似女性。图5面形粗犷高大,男性体质特征明显;面部宽而扁平,鼻梁较直,中等唇厚,唇形稍凸;颧骨突出,这些体质特征属藏族特征。藏族体质特征从总体上与现代中国人的体征属同一个种族类型——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其中椎骨有21椎节之数。



图3 敦煌本藏文穴位图残卷(P. T. 1058)



图4 《灸经图》针灸裸体女图

《灸经图》各图均系人形全身正面或背面图,独缺侧面图,且各图都有两个从头角束起的发髻,脐眼、椎骨、肋骨标示分明。各图形相比,图4均在胸部标记两乳头穴点,面形较小巧清秀,拟似女性;图4在阴部标有玉茎,面形较宽大方圆,拟似男性。与藏族的体形相比显现中原汉族特征,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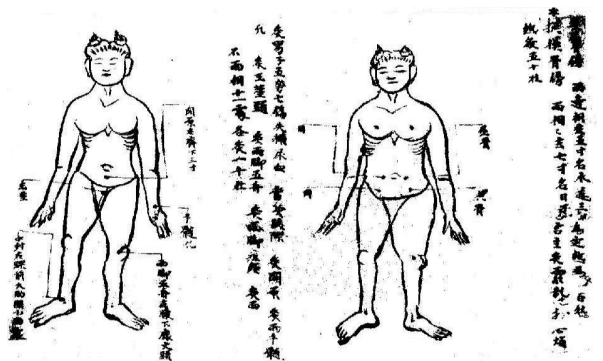


图5 《灸经图》针灸裸体男图

中椎骨不足21节之数。藏汉灸图都是分男女的裸体图,都有两个发髻,肋骨标示分明,阴部无遮掩,骨性和皮性标记比例适中,这些共同点说明两者关系密切,互缺的正侧位图也绝非历史巧合,而是说明两者存在取之短、补我之长的借鉴关系。河南、山东、湖南、四川、新疆等地都有秦汉时代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的石刻和壁画,但在水出文物新石器时代彩陶中,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的图画和陶器是目前国内能够证明伏羲、女娲活动于天水一带的最有力证据。经考究,伏羲文化与天水大地湾文化在时间和形式上基本一致,展示出了距今已有8000年至5000年前华夏先祖光辉灿烂的龙文化。这种亦人亦兽的形象是龙图腾崇拜的始祖,也是祖先用蛇身交尾来比喻人类男女生殖崇拜。秦始皇兵马俑、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绘画中没有裸下体的图。《千金翼方》载:“孔穴难语,非图莫可”,可见经穴图的重要性。从文字记载可以看出,我国古代有多部针灸图产生,但均已失传。裸体针灸图更被视为亵物而隐秘不宣,宋铜人也腰束裙带以遮掩下身。藏医挂图“曼唐”历史悠久,从远古产生的火灸疗法诞生的首张《藏医穴位图》,到1704年绘成共79幅全套“曼唐”,这在我国医学史上不仅是创举,在世界医学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崇尚自然是藏医学的历史特征,不论是从图的内容上还是从图的成书环境方面,《藏医穴位图》都是史上最早的灸穴图。《灸经图》借鉴了《藏医穴位图》侧面裸体图,绘制了其独缺的正面或背面裸体图。《藏医穴位图》以侧面裸体图而不直接显露性器;《灸经图》在正面也不直接显露性器,仅会意似在阴部标记穴点以指玉茎头。目前国内出土最古老的男女裸体图是商晚期(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阴阳直立玉人,玉器呈直立状,两面饰纹略异,其中一面形作一男性像,一面为女性像,皆裸体,梳角形发髻,其形体与《灸经图》人形极为相似,说明《灸经图》源远流长,历史久远。

人神禁忌敦煌同时出土的《新集备急灸经》(P. 2675)仅画有人体正面的上半身图,用线条标注穴名、部位、主治及灸法。有令人垂两手中指头股上、手心、足心、膊肩井穴与《藏医穴位图》相似记载,但已经有了较多穴名。卷末写有抄写时间为咸通二年(公元1862年),这是敦煌灸疗医书中唯一标明抄写年代的卷子,也是世界印刷史早期有印本医书流传的重要证据和唐代刻印的针灸专著。从该书序中提到的“四大成身,一脉不调,百病皆起四大”和“百一”的说法,可以看出其受印度佛家思想影响。写卷背面有“人神禁忌”内容,这种说法认为人体内有一种称之为“人神”的特殊东西,它按年、季、月、日、时存在于一定部位。如果针灸误中于它,就会发生意外损伤,甚至死亡。这一说法与藏文P. T. 1044. “善度的神仙,名曰哈达那毗,它的灸法:要挑选好日期灸,要弄清当日的生命点(在何处),生命点上不能灸。好灸日期是:一年四季以春季最佳……”这里人神与生命点名异而实同,“人神禁忌”源于印藏的生命点,特别是唐代的医学文献,如《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黄帝明堂灸经》《灸经明堂》《新集备急灸经》等均记载有人神禁刺灸法的内容,而此内容在针灸医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黄帝内经》及以后中医学,马王堆针灸帛书及《灸经图》都没有类似内容,说明《灸经图》流派存世最早时间应该是唐代以前,早于《黄帝内经》。

6 从《灸经图》看针灸穴位定位定名的过渡风貌

与《黄帝内经》中所描述的传统针灸相比,《灸经图》中穴名及取穴位置存在差异。针灸腧穴的形成与发展经过了穴位从无定位、定名发展到不确切的定位定名,再到确切的系统的定位定名,穴位的数量也历经由少到多,循序渐进,逐步深化的传承发展过程。《灸经图》的穴名及取穴法反映了《足臂十一脉灸经》之后,《黄帝内经》之前不确切的定位定名特征,也显示了古代流派独具的特色。

6.1 从经脉名及穴位数量看《灸经图》的发展阶段 《足臂十一脉灸经》有脉无穴;《灸经图》^[4]有66穴,其中单穴16个,双穴50个;《黄帝内经》有160个穴,其中单穴25个,双穴115个);《针灸甲乙经》确立了349个腧穴,其中单穴49个,双穴300个;《铜人》和《十四经发挥》增加到354个腧穴。从穴位数量上可以看出《灸经图》处于《黄帝内经》之前的阶段。

6.2 从穴位数量看《灸经图》与历代针灸典籍的发展脉络 《足臂十一脉灸经》有11脉但无穴位;

《灸经图》现有足太阳膀胱经,经脉名穴位4个,即手阳明、足阳明、足太阳,足厥(足厥阴);《黄帝内经》有12经脉,12个经脉穴,即手足太阳、阳明、少阳与手足太阴、少阴、厥阴。从经脉名穴位数量可以看出《灸经图》处于《黄帝内经》之前阶段。

6.3 从《足臂十一脉灸经》与《灸经图》看早期针灸取穴特色 《足臂十一脉灸经》经脉走向以人体部位为标示,《灸经图》也以人体部位、自然标志取穴较多,如扳眉(在眉上一寸,眼睛直视瞳孔上是传统针灸指阳白穴,以下同),曲眉(两眉间,眉毛头是。攒竹),玄角(在额两角发际。头维),发际(鼻柱直上发际宛宛中),口吻,乳头,鼻柱,胃管,玉茎头,十三节两边相去二寸三分,手心,足心,手十指头,手小指头,足小指头,大指上三毛,屈骨,横骨等。此类穴简单明了,通俗实用,对普及针灸疗法有重要意义,也反映了针灸发展初期穴名多以人体部位、自然标志取穴。

6.4 《灸经图》与传统针灸穴名及位置差异对比 与《黄帝内经》穴名、位置相异,同一部位有几个不同腧穴名称,如传统针灸天庭穴位于前额正中部,《灸经图》中天庭穴位于头后部,并且为呈菱形分布的四个穴^[5]。传统针灸风府穴为单穴,位于项部正中线入发际一寸处,而《灸经图》中风府在项后两厢宛宛中;传统针灸认为风池在风府平行的两侧发际陷中,而《灸经图》中风池在风府上二寸陷中,其部位应是玉枕穴;传统针灸脏腑腧穴均取椎节两边相去1.5寸和3寸线上,而《灸经图》选用腧穴取椎节两边相去2.3寸;传统针灸认为肺俞在第三节两边,相去一寸五分,而《灸经图》在第三节两边,相去二寸三分,分别布有风门、小腹俞;传统针灸认为在第九椎两边,相去一寸五分是肝俞穴,而《灸经图》却在第九椎两边相去二寸三分布有肺俞穴;传统针灸认为风门在第二节两边,相去一寸五分,《灸经图》所指风门是肺俞穴;传统针灸在第8胸椎下、第十七椎下旁开没有分布脏腑腧穴,《灸经图》中第8胸椎下旁开二寸三分布有聂腧穴,在大肠俞与小肠俞中间第十七椎下旁开二寸三分布有大小肠俞,在十三节两边,相去二寸三分布有三焦俞;传统针灸认为肩井、肩髃是两个穴,而《灸经图》却在图1将肩井、肩髃合为一穴标引;脚五舟、足五舟在《灸经图》图1、图5两处,分别位于膝腓部之内方;将天门穴放在脑后尖骨上一寸处,与传统针灸脑户穴位置相符;髓孔,绝骨二名一穴。

6.5 《灸经图》针灸穴名演变与流派传承 《灸经图》有现存历代针灸医籍未见登载的独特穴名,如

扳眉、天门、天庭、四天庭、聂俞、脚五舟等^[6]；有先秦、秦汉时代习用的腧穴别名、宋代以后多不复用的穴名，如手阳明、足阳明、足太阳、足厥、颊车髓孔、手髓孔、足髓孔、髓孔、慈宫、胃管、两手五井、两脚痹经等。其与《黄帝内经》同身寸相一致的取穴有关元、足三里、髓孔、百会、完骨、脊中等穴。《黄帝内经》对经络、腧穴、针灸方法以及适应证、禁忌证，特定穴如五腧穴、原穴、下合穴、十五络穴、五脏背俞等都作了较详细的论述，而《灸经图》除有个别穴位外，并无感传路线，其他均为空白。《足臂十一脉灸经》所主疾病有78种，《灸经图》^[7]记载了45种病症，两者均为灸疗专著，都用灸法治疗，可见两者传承关系一般。《黄帝内经》中记载了一百多种病症，其中多数疾病都应用针刺治疗，灸法治疗者占极少数。与《黄帝内经》比较发现，《灸经图》在针灸腧穴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更为原始、古朴，它与传统针灸穴名及取穴位置存在较多差异，说明《灸经图》是一种过渡阶段灸法专著，它继承了先秦、秦汉时期腧穴名称，保存了早期不同历史时期的穴名及古代灸法著作的部分风貌^[8]，也佐证了《灸经图》流派存世的最早时间是秦汉《足臂十一脉灸经》之后，早于《黄帝内经》。据考证，孙思邈《千金翼方》杂灸法中有较多引文，其语言风格与灸疗内容多与《灸经图》注文相似，推测其来源为同一书。

7 从古籍文献看“五劳七伤”的历史溯源与关联

五劳七伤病名与武威汉简关系密切，都是在纸未发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书籍文献。从公元前17世纪的殷商开始到公元300多年的魏晋时期，古老的华夏文明用竹木简牍延续了2000多年的时间，直到造纸术出现后，简牍才逐渐被淹没于历史长河中。武威汉墓出土的《治百病方》汉简中的医方全是复方，反映了当时药物配伍普遍应用，内容更完整、更具体、更明确，是研究秦汉医学的第一手资料。《灸经图》^[9]组方中灸治最重要的病症是五劳七伤，马王堆《天下至道谈》房中导引术最为核心的概念是七损八益，七损（损）：一曰闭，二曰泄，三曰渴（竭），四曰勿，五曰烦，六曰绝，七曰费。《黄帝内经》有五劳病症，《素问·宣明五气篇》载：“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谓五劳所伤。”公元7世纪初，《诸病源候论》中七伤为：“大饱伤脾，大怒伤肝，强力举重、久坐湿地伤肾，形寒饮冷伤肺，忧愁思虑伤心，风雨寒暑伤形，恐惧不节伤志。”它包括了因

起居、饮食失节、六淫、七情、劳作所伤引起的脏腑病变。马王堆帛书有男子七损、武威汉简有男子七疾和七伤的记载。武威汉简方十四：“东海白水侯所奏方，治男子有七疾及七伤。何为七伤？一曰阴寒；二曰阴痿；三曰阴衰；四曰囊下，湿而养，黄汁出，辛患；五曰小便有馀；六曰茎中患如林状；七曰精自出，空居独怒，临事不起，死玉门中，意常欲得妇人。日甚者，更而苔轻重，时腹中患，下弱旁光，此病名曰内伤……”

8 小结

多元文化及任何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是连续性，《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亦是如此。《黄帝内经》最早载录在《汉书·艺文志》中，《黄帝内经》曾经引用的医学文献达20余种，吸纳博采了各家之长，是秦汉以前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古天文历法与医学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理论巨著。《灸经图》其成书年代早于《黄帝内经》，是过渡阶段的灸法专著。

参考文献

- [1] 王天生. 敦煌石窟《灸法图》特点及临床价值探讨[J]. 中国针灸, 2003, 23(11): 690-692.
- [2] 宇妥. 云丹袞波四部医典[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22: 3-8.
- [3] 汤志刚, 张瑞. 敦煌《灸经图》背部腧穴取二寸三分与横向经脉[J]. 西部中医药, 2014, 27(12): 25-27.
- [4] 王天生, 汤志刚, 吕兰萍. 从敦煌《灸经图》看早期膀胱经脉循行[J]. 中国针灸, 2010, 30(4): 336.
- [5] 王天生, 汤志刚, 李晖霞, 等. 同名四穴组的沿革[J]. 中国针灸, 2011, 31(1): 39.
- [6] 王天生, 吕兰萍. 敦煌遗书《灸经图》载穴临床应用体会[J]. 中国针灸, 2005, 25(5): 345-347.
- [7] 王天生, 汤志刚, 张瑞, 等. 关于敦煌《灸经图》保健灸治未病组方探讨[J]. 中国针灸, 2011, 31(4): 375-379.
- [8] 王天生, 张瑞, 汤志刚, 等. 论敦煌古《灸经图》之特色[J]. 中医杂志, 2010, 47(8): 224-226.
- [9] 王天生, 吕兰萍, 王永强. 敦煌遗书《灸经图》治疗五劳七伤特点初探[J]. 中国针灸, 2006, 26(10): 753-755.

收稿日期: 2024-12-08

*基金项目: 2022年兰州市科技发展指导性计划项目(2022-5-129)。

作者简介: 汤志刚(1979—), 男, 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 敦煌医学及脾胃病的中医诊治。Email: 236450896@qq.com。